

魏建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

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

——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

朱德发 著



人
文
社

魏建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

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

——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

朱德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肖 辉 孙文君
版式设计:亚细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朱德发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魏建主编
ISBN 978-7-01-015930-0

I. ①为… II. ①朱… III. ①新文学(五四)-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8859 号

为大中华 造新文学

WEI DAZHONGHUA ZAO XINWENXUE
——胡适与现代文化暨白话文学

朱德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15930-0 定价:6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新发现 新探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申请并完成的特色国家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其学术参照首先是来自丹麦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所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

—

一百多年来，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直是中国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文学史经典之作。中国学人为什么推崇这部著作？为什么能推崇一个多世纪？究竟是书中的什么东西构成为中国学人的集体性认同呢？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来说，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07年鲁迅先生写《摩罗诗力说》的时候就向中国人介绍这位“丹麦评鹭家”^①。此后鲁迅多次提及勃兰兑斯和他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②鲁迅先生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史家。他对文学史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但很少向人推荐文学史著作。勃兰兑斯的这部书却是鲁迅向人推荐的为数极少的文学史著作之一。《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学术生命力主要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 这是当时的译名。现在通译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来自它作为文学史叙述方式的独标一格。直至今日，第一次阅读这套书的中国学人依然大为惊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样写！这种惊叹包括很多内容：文学史原来也可以这样抒情！文学史原来也可以写那么多的故事！文学史的行文原来可以这样自由地表达！文学史的结构原来可以这样地随意组合……当然，惊叹之余，读者大都少不了对这种文学史写法的将信将疑。“将信”是因为被书中的观点和引人入胜的文字打动，“将疑”是因为书中有太多名不副实的東西，如：该书取名为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实为十九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现象，最晚的才到1848年；书名没有地域范围，说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主流，而实际上只是欧洲，又仅仅限于英、法、德三国；名为“主流”，有些分册论述的倒像是“支流”，如“流亡文学”、“青年德意志”等。

虽然中国学界不断有人对此书提出一些异议和保留，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作为文学史著作的经典地位始终没有动摇。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但凡是经典著作都有可供不断阐释的丰富内涵。起初中国学者首先看重此书的，大约是认同其革命主题（如“把文学运动看作一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①）和适合中国人的文学价值观（为人生、为社会、为时代），还有对欧洲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当时多称之为“自然主义”）文学潮流的描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中国最走红的时期，书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②的论述成为中国大陆文学史研究界引用最多的名言之一；其贯穿始终的“处处把文学归结为生活”^③的“思想原则”亦成为当时

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前言第1页。

②【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第1页。

③【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中国文学研究者人所共知的文学理念。后来，书中标榜的精神追求（“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表现”“独立而卓越的人类灵魂”^①）和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及方法更为中国的学术新生代所接受。近年来，中国学界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关注热情虽然有所减弱，但对它的解读却更为多元，少了一些盲目的崇拜，多了一些客观的认知。正是在这种相对客观的解读和对话中，《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给我们的启示逐渐增多。

综上，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总是能够不断地进入不同时期中国学者的期待视野。也正是因此，这部著作内涵的丰富性完全是由阅读建构起来的，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读出来的文学史巨著。本课题组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学术起点是以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一书的高度认同为基础的，其学术目标意在撰写一部像《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样的文学史著作。

二

当然，《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中国人对这部巨著的认识还有很多误读，所得观点有很多属于望文生义的想当然，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被忽略。例如，对其中独具特色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就缺乏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我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课题组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就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获得了诸多启示。

首先，我们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上所获得的第一个启示是思辨与实证的结合。《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将抽象思辨与具体实证结合在一起的一部著作，并且结合得比较成功。可是，迄今为止中国学人论及《十九世纪文

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李宗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学主流》，更多地看取了其思辨的一面，而忽视了其实证的一面：过于渲染《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如何“哲学化”地“进行分馏”^①，如何高屋建瓴般将文学“主流”提炼出来，却大都忽视了这是一部实证主义倾向非常显明的文学史著作。

读过《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人一定不会忘记，在第二分册的目录之前，整整一页只印着这样几个字：

敬 献

伊波利特·泰纳先生

作者

除了伊波利特·泰纳，没有第二个人在书中获此殊荣。而伊波利特·泰纳是主张用纯客观的观点和实证的方法解说文学艺术问题的最有影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勃兰兑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师法伊波利特·泰纳“科学的实证”的批评方法。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他将思辨与实证相结合，所以才能把高远的学术目标落实到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才能做到既有理，又有据。这是勃兰兑斯的做法，也是前人成功经验的总结，尤其在当下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斥“假、大、空”学风的浮躁氛围里，思辨与实证的结合更应成为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首选。

其次，我们在文学史的叙述方法上所获得的启示是宏观概括要渗透到微观描述中。这方面，《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在宏观历史叙述与微观历史叙述结合上开创了成功的先例，做得相当成功。然而，多年来中国学者更多地看取其宏观历史叙述一面，而忽视了它微观历史叙述的另一面。对此，勃兰兑斯在书中讲得很清楚，“有许多作品需要评论，有许多人物需要描述，

① [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1。

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只从一个方面来照明整体，使主要特征突现出来，引人注目，乃是我的原则”^①。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的宏观历史叙述就是概括“主要特征”，其微观历史叙述就是凸显历史细节，包括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这二者如何结合呢？勃兰兑斯的做法是：“始终将原则体现在趣闻轶事之中。”^②的确，《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大多数章节都是从小处入手的，流露出对“趣闻轶事”的浓厚兴趣。然而，无论勃兰兑斯叙述的笔调怎样细致，其叙述的眼光可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时代、民族、宗教、政治、地理等大处着眼。让读者从这些琐细的事件中洞见到人物的心灵，再从人物的心灵中折射出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种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东西。这就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一个个小事件里所蕴含的大气度。

再者，在文学史的结构方法上，我们所获得的启示是以个案透视整体。从著作结构上来看，《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好像没有任何外在的叙述线索，全书呈现给读者的是把英、法、德三个国家的六个文学思潮划分为六个分册。每一分册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关系。对此，勃兰兑斯做过两个形象的比喻解说他的各分册与全书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比喻是：“我准备描绘的是一个带有戏剧的形式与特征的历史运动。我打算分作六个不同的文学集团来讲，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构成一部大戏的六个场景。”^③第二个比喻是：“在本世纪诞生之初，我们发现一种美学运动的萌芽，这种美学运动后来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在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如果以植物学家的方式来解剖这种萌芽，我们就能了解这种植物符合自然规律的

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③【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引言第3页。

全部发育史。”^①第一个比喻是强调这六个分册之间独立、平等、连续的并联关系；第二个比喻揭示了这六个分册之间发育、蔓延、生成的串联关系。这两个形象的比喻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各分册与全书存在着深层的有机关联，看似孤立的每一个个案都具有透视整体文学运动的效用。

三

开诚布公、实事求是而言，我们课题组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显然受到了《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种种启发，但启发不能只是简单的模仿。如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变成对《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照搬或套用，那就只能陷入东施效颦式的尴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之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有继承，也有创造。

“创造”之一，是通过“地标性建筑”来展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

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不仅效仿和追求《十九世纪文学主流》那种在实证的基础上思辨、在微观叙述中显现宏观、通过个案透视发育的整体的研究思路方法，还从“实证基础”、“微观叙述”和“个案透视”中找到了一些合适的“载体”。这些“载体”好比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图中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将这些“地标性建筑”作为历史叙述的基本单元，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新阐释，才能落实到操作层面。这些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基本叙述单元的“地标性建筑”，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那些重要的文学板块，如：言情文学、白话文学、青春文学、乡土文学、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武侠小说、话剧文学、延安文学、红色经典、散文小品、港台文学、新诗潮、女性文学、

^①【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四分册，徐世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1页。

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文学史著述、影视文学、网络小说等。这些不同的文学板块分别构成了我们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丛书的不同分册的学术研究问题。各分册与整个丛书的关系是分中有合、似断实连。所谓“分”与“断”，是要做好对每一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的研究。这样，通过个案的透视，既能使实证研究获得具体的依傍，又能把微观描述落到实处；所谓“合”与“连”，是要在对一个个“地标性建筑”（文学板块）聚焦中借以观测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嬗变。

“创造”之二，是通过“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套书系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确给予我们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这只能说明我们从中获得了西方学术的有效营养。然而，西方的学术资源无论具有多少普适性，对于解读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人的心灵，毕竟是有限度的。在超越株守传统观念的保守主义而走向全面开放的今天，在超越盲目崇洋的虚无主义、畅想民族复兴的今天，中国本土的学术资源更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加以现代转化。

“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一直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两大传统。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力求“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这既是本课题学术目标和学术规范的要求，也是其特色所在，更是其学术质量的保证。由于目前学界相对忽视“我注六经”的研究，因此本课题提倡在做好“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好“六经注我”。为此，本课题成果分为两套书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历史档案书系”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学术新探书系”（以下分别简称“历史档案书系”、“学术新探书系”）。“历史档案书系”可称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一期工程”，“学术新探书系”可称为“二期工程”，出版这两套书系将有助于深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

首先，出版“历史档案书系”无疑体现了对文学史文献史料的高度重视。这种重视既强化了文献史料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作用，又传达出一

种重要的文学史理念——文献史料是文学史“本体”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每一个文学板块的文献史料进行多方面、多形式的搜集和整理，展现这一文学“地标性建筑”的原始风貌，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了这一文学板块的历史记忆。这岂能不是文学史的“本体”呢？如傅斯年宣扬过“史学便是史料学”^①。再如，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的文献史料大都不是以论据的形式出现，而常常构成叙述对象本身。当今天的读者同时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平分秋色的时候，这种理念应是一望便知。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的每一个文学板块都有“历史档案”和“学术新探”两部著作。二者的学术生长关系将会推动这一板块的研究甚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两套书系中的所有文学板块完全相同，即每一个文学板块是同一个子课题，如朱德发教授负责“五四白话文学”子课题。他既要为“历史档案书系”编著“五四白话文学”卷的文献史料辑，还要在“五四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的基础上撰写“学术新探书系”中刷新“五四白话文学”问题的学术专著。显然，这样的两部著作之间具有学术生长关系。前者既重建了这一文学板块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又为后者的学术创新做好了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后者的“学术新探”由于是建立在“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不仅能避免轻率使用二手材料所造成的史实错误和观点错误，而且以往不为人所知的文献史料会帮助研究者不断走进未知世界，不断获得全新的学术发现。所以，“历史档案”会成为“学术新探”不竭的推动力。

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还有几个需要说明的具体问题：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第四讲《史学论略》，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

1. 关于“主流”

本课题组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中的“主流”界定为：“以常态形式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的文学。”也就是说，所谓文学“主流”，不是先锋文学，而是常态的文学。常态文学的发展，总是与读者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是属于少数读者的文学，也就是“先锋”文学，所以不是当时的“主流”文学；而这一时期的白话文学适应了多数读者的要求，成为晚清以来不断转化成的常态文学。

2. 关于“历史档案书系”

如前所说，“历史档案书系”主要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文学板块的原始文献和基本史料进行专业化的搜集和整理，重建各个重要文学板块的历史档案，利用来自历史现场的文献、史料或调研成果，尽可能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各文学板块的历史记忆，进而展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原生态风貌。因此，“历史档案书系”追求文献和史料的“原始”性，其各卷的主要内容以“原始史料”和“经典文献”为主，以“回忆与自述”和“历史图片”为辅。所有文献和史料凡是能找到初版本的，我们尽量选用初版本；有些实在找不到初版本的，会选尽可能早的版本。

3. 关于“学术新探书系”

“学术新探书系”是在“历史档案书系”所提供的来自历史现场的文献、史料及其直接、形象、立体地保存的原生态风貌的基础上，对这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标性建筑”，逐一进行全新的学术开掘。因此，“学术新探书系”追求学理性和创新性。其各卷的主要内容，从各卷实际出发，不求体例的划一，只求比前人的研究至少提供一些新的学术发现。

4. 总课题与子课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是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承担的

集体项目。总课题的选题及其初步编写方案由主编设计，在课题组成员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实施方案。子课题的作者均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团队成 员，亦大都是不同分卷所研究的某一文学板块的研究专家。主编和课题组成员充分尊重各子课题作者的学术个性，以保证各卷作者学术优长的发挥和各子课题学术质量的提升。各卷作者拥有独立的著作权，文责自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流”这两套书系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实践，难免存在尝试之作的稚嫩和偏差。我们渴望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帮助。我们最忐忑的是，不知学界的同行们能否认同——文学史的这样一种做法。

魏建

2015年8月

代序 重探六十多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

——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

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立，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已走过六十多个年头。虽然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经过几代学人的探索与建设，中国新文学史已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个并不年轻的学科仍在认识上存在不少误区。五四新文学自从纳入学科体制研究和书写以来，既是重头戏又是敏感区，对其性质的认知和判断总以为五四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学”^①，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文学。据此，为新学科奠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明确指出，“新文学从开始起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②；1979年版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断定，“‘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一页”^③。这两部文学史通过现行教育体制，对

① 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草拟：《〈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4期。

②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③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规范与影响，既深且远；即使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新时期，不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写或者现代作家作品及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也没有完全突破上述两部“经典性”文学史有关五四文学革命在性质上的理论判断，并逐步衍化引申出五四文学革命同古代文学实行了彻底决裂、形成了古今文学大断层、现代文学生成是以彻底否定传统文学为前提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是异质相对的、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的否定是整体性的而不是局部的、五四文学运动从根本上颠覆了古代封建文学等等见解，一言以蔽之，“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文学的”。笔者并不认为上述对五四文学革命在性质上的判断和见识是没有根据的或毫无道理的，只是感到五四文学革命并未达到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学这样的程度、深度和力度，更没有彻底地整体地否定和反对传统文学，这种理性判断难免有绝对化和武断化之嫌，形成了对五四文学革命在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尽管近几十年关于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也发表或出版了不少有见地的研究著述，尤其古今文学的贯通性和五四文学的启蒙性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越来越摆脱了新与旧、古与今、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羁绊，而将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动态整体系统来把握和研究，但是这些新的研究思路及其取得的学术成果，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或消解了对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那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文学的政治判断，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是否是彻底地反对传统文学并未从认识上得到真正解决，不论那些坚决捍卫五四文学革命者或是那些诋毁五四文学革命者，都有一个对五四文学革命性质重新进行科学地辩证地认识和评价的问题，使之尽快走出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认识误区，以逼近历史的真面目。

一、重读原文求真相

考察并回答五四文学革命是否彻底地整体反对传统文学这个已成为某

种思维定见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思路进行探讨，但是我认为最有雄辩力的结论应该回到特定的历史范畴去寻找，既不能依凭现成的理论框架到史实中择取几个例证或片段来印证既定的论点，又不能根据某种现实需要对历史进行任意拔高而做出实用主义的阐释，必须设身处地回到五四文学革命的原生态历史中。尽管八十多年前的原生态可想而知，不过从发表于当年期刊杂志上的文学先驱们提倡文学革命的文论里，总可以触摸或感受到五四文学真实的生态与史迹。比如：从先驱们倡导文学变革的文论中，根本找不到以阶级论把中国古代文学定性为封建主义的判断，只有“旧文学”或“贵族文学”这样的表述；后者的表述不是把古代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不能相容不能调和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面，惟有前者的封建主义文学的阶级定性判断才把古代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相互对抗不能调和的对立面，这样的所谓阶级分析无疑会引申出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地整体地反传统文学的结论，不过这个任意上纲的主观判断并不符合文学革命先驱们文论的原旨和本意。先驱们倡导文学革命的文论各抒己见，是学术性的，讨论式的，论辩式的；本书不可能对每篇原创文论都给予重新解读重新认识，拟选择一些重要的足以代表文学革命倡导者的文学观念和对传统文学态度的文本进行探索与分析，借以窥视五四文学革命是否是彻底反对传统文学的。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理论倡导先行，有什么文学理论主张才有什么样态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创作，故弄清了文学理论观念就可以看清其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对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判断大多是从倡导者的重要文论中寻找根据的，不管是断章取义或者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大都取之于文论，故只有对原创文论重新解读方可摸准先驱们对传统文学的真实态度；三是古代文学等同于传统文学，却不等于封建主义文学，以封建主义来涵括古代文学或传统文学这是以偏概全，只有重读五四文学革命的文论，方能从先驱们原汁原味的理论表述中体会其对传统文学的真知灼见。

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是胡适、陈独秀等几个人闹起来的，这有点夸张，

不应该把这件决定中国文学走向与命运的重大现代性历史事件只归功于胡适等少数人，那么我们真正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却会深切地感受到胡适首举义旗提倡文学革命确实扮演了领袖的角色。没有他的连篇累牍地发表文论进行积极倡导和大胆尝试白话写作，至少文学革命不会来得如此迅捷。五四文学革命肇始既不是一种国家行为又不是一种政党行为，主要是聚集于北京大学的一批具有先锋意识的知识分子，获得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为阵地，在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启迪与煽动下所展开的学术性的民主讨论，很长一段时间限定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而胡适与陈独秀则成了文学革命的“自然领袖”，他们的文学观念和主张无疑成了文学革命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理所当然地决定着这场文学革命的性质。因此，解读胡适与陈独秀的文论，在相当程度上就可断定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是彻底地全方位地反对还是具体地辩证地来对待。

那就先解读透析胡适原创的文论吧。“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起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①胡适发表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于文学革命勃兴便起到“惊雷”的作用，它提出的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及对“八事”逐一进行具体分析，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彻底否定，也没有把古代文学定性为封建主义，而对古代文学既有批判又有肯定。所批判的不是古代文学的整体只是存在的弊端，若此弊不救势必阻遏中国文学的健全发展；虽然它对古代文学的弊病指斥得不少，但主要是“近世文学之大病”，由此见出胡适文学改良的重点是针对近代文学的弊端而非古代文学。比如，“一曰须言之有物”，主要针对“近世文学之大弊”，即明清以来文学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使指出近代文学的大病拟通过改良来医治它，也不是要彻底否定明

^①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沉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